

盲区：关于博物馆研究的博物馆学

Blind Spots: Museology on Museum Research

奥洛夫·格杜尔·西格福斯多蒂尔¹ 著 翟磊² 译

Ólöf Gerður Sigfúsdóttir¹ Translated by Zhai Lei²

(1. 冰岛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雷克雅未克, 101; 2.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1.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Iceland, Reykjavik, 101; 2.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Beijing, 100006)

内容提要：研究被认为是博物馆的四项基本实务之一，与收集、保护和展示同等重要，并为博物馆的其他活动提供基础。然而，研究仍是博物馆实务模糊的组成部分，有时甚至被公众忽视。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初博物馆学重塑以来，研究一直是其中一个被忽略的话题，只有很少的成果。在本文中，笔者探寻关于博物馆研究的博物馆学线索，并找出研究文献中的空白，通过为当代博物馆学中的博物馆研究提供批判性分析的空间，探索博物馆研究在广义科学层级中的地位。由此，笔者采用认识论的方法讨论博物馆作为科学与文化交界处的公共机构这一议题。

关键词：博物馆研究 知识生产 认识论 科学层级 非传统研究

Abstract: Research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four fundamental museum practices, equal to collecting, preserving and display. As such, it is understood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many other activities carried out in museums. Yet research remains an ambiguous component of museum practice, sometimes entirely invisible to the public eye. Moreover, it remains a neglected topic in museology, with only a few publications on the subject since its disciplinary reinvention at the turn of the 1990s. In this article, it explores museological strands towards research in museums and identify gaps in the literature. By carving out a space for a critical analysis of museum research within contemporary museology, it aims is to explore the place of museum research within the wider hierarchy of science. By doing so, take an epistemological approach to museums as public institutions in the borderland between science and culture.

Key Words: Museum research; knowledge production; epistemology; science hierarchy; alternative research

一、俯瞰博物馆研究^①

博物馆学是研究作为公共机构的博物馆，并对其社会作用和功能进行理论建设的学科。随着博物馆学的新旧革替，对博物馆的社会政治及伦理相关议题的批判分析取代了先前对博物馆运营的理论与实务的兴趣，并对博物馆的行政及组织结构提出了批判性观点。随着1989年维戈（Vergo）的《新博物馆学》出版，当代博物馆学将博物馆的社会文化与哲学基础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目的是增强博物馆与其所处社区的联系。从这个转折点开始，博物馆学已经被后殖民理论、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及制度性批判所影响，并通过能动性、真实性、政府治理、包容性、性别和道德的概念视角来研究博物馆^②。最近，人文社科中的视觉理论和物质文化研究的转向，则进一步加强了该学科的批判性^③。这种理论更新催生了“对博物馆一系列新的期望，包括更具责任感，敏锐性和开放性”。然而，关于博物馆作为研究机构的研究在新博物馆学议程中仅受到有限的关注。博物馆实务的核心要素，例如收藏、记录、保护与展示都备受关注，而研究获得了较少关注。因此，

在当代博物馆学中，博物馆研究仍是一个边缘话题，博物馆专业人员的系统论述相对少见^④。

在博物馆学的历史中，除了一些针对研究的行政管理实用手册^⑤和关于博物馆研究现状的立场文件^⑥，博物馆学较少关注博物馆作为知识生产场所的性质。相似地，用来重启批判博物馆学的基础文集与教科书很少涉及博物馆研究的主题^⑦。零星的案例分析提供了个别研究项目的丰富信息^⑧，却极少在更广泛的博物馆学话语背景下阐述。最后，两本研究汇编系统论述了博物馆研究的议题，尽管内容丰富且具有启发性，但已有十年历史了^⑨。学术上的忽视或能带来对博物馆作为研究机构或认知机构的更多关注。为支撑博物馆作为认知平台的观点，笔者将概述近三十年来文献中出现的新趋势，并进一步探讨与科学领域相关的博物馆研究。笔者将讨论局限于馆藏的研究，此类研究的成果会通过展览或其他三维展示技术在博物馆空间中传播。将博物馆研究单列出来，并不意味着它优先于其他基础活动，或它能同其他基础活动分离。

二、博物馆学趋势

在探索博物馆研究主题的文献时，两条研究主

① 译注：本文将museum research译为博物馆研究，专指博物馆的研究职能。museum study也可译为博物馆研究，是关于博物馆的各类研究。

② 博物馆学向新博物馆学的变革产生了一批核心文集和专著。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参考文献[3]、[7]、[11]、[18]、[20]、[21]、[23]、[34]、[35]。这些核心文本揭示了博物馆活动的社会政治与伦理的复杂性和挑战，但是对于作为博物馆实务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研究关注非常有限。

③ 物质和视觉文化方面的主要研究为当代博物馆学提供了信息，例如参考文献[4]、[6]、[26]、[28]。

④ 以博物馆研究为主题的国际会议是零星的。在过去15年的研究中，只发现了一些会议活动，以及活动后可用的文件与会议记录：2005年渥太华博物馆研究峰会（由加拿大博物馆协会组织）、2007年斯德哥尔摩研究与博物馆国际研讨会（由瑞典国家博物馆、诺贝尔博物馆和瑞典皇家科学院组织）、2018年柏林博物馆研究全球峰会——研究的变革潜力（由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和莱布尼茨科研博物馆组织）。以博物馆研究为重点的地方会议很可能是在国家层面举行的，国际观众无法接触会议记录。安德森指出，研究一直是博物馆策展人关注的话题，尽管有关该主题的文献很少。

⑤ 见参考文献[1]、[24]。

⑥ 见参考文献[2]、[15]、[16]、[30]。

⑦ 见参考文献[3]、[9]、[22]。

⑧ 关于馆藏研究项目的案例研究，见参考文献[10]、[17]、[19]、[27]、[33]。

⑨ 《研究与博物馆（RAM）：2007年5月22—25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和《展览是学术的产物和创造者》。其他重要贡献也可以在2005年《博物馆管理与策展》专刊中找到，包括加拿大博物馆协会2005年关于研究的会议记录。在这一期，安德森的论文主要从英国的角度广泛地说明当时研究在博物馆中的地位。

线浮现：第一条聚焦于博物馆与知识生产间的一般关系，并不直接讨论研究本身；第二条聚焦于博物馆研究的地位与现状，更强调具体研究项目的描述性说明，并非与其他研究领域的理论阐述或情境化。

1. 博物馆与知识

博物馆不仅对西方社会的知识形成，也对知识形式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这已被博物馆学者所证明。塔克（Tucker）将博物馆描述为构成社会的元叙事。博物馆的早期发展及与其他认识论形式的关系，例如学科、科学和大学的建构，已有诸多开创性研究。这些研究被视为基于认识论方法的博物馆学中的一个子主题，对博物馆知识生产的本质及其在博物馆空间中的合理化与合法化进行了批判性考察与分析。这些研究的共通之处是突出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实践——从获取对象、记录、分类与归档，到标记、组装和展示——而不是将其纳入研究政治的当代论述中（笔者将在下文展开论述）。同样，关于馆藏与科学的关系著述颇丰，但少有反思当前博物馆实务对科学与研究层级的影响。不过，学者已说明自文艺复兴以来收藏对象对学科形成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例如自然史与经验科学、艺术史与考古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其中，胡珀-格林希尔（Hooper-Greenhill）针对博物馆与知识相互关系的研究最具影响力。她描述了博物馆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观念秩序的作用，说明了如何通过特定的收集和展示形式来表达认识和理解的方式，并将其排列到福柯的认识论分期之中：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①。怀特黑德（Whitehead）以类似的方式探索了博物馆与艺术史和考古学作为学科成形的平行历史。他通过解释“收集、分类、保护与展示等文化行为实际上将世界理论化”来强调博物馆的认知作用。其他博物馆学者也从权力与政治的视角来探讨博物馆与知识的关系。

2. 适得其反的分割线

在博物馆学论述中，将研究与公众活动相竞争的博物馆活动并置是主旋律。对于新自由主义资助模式如何迫使博物馆将自己塑造成注重预算责任和管理效率的服务机构，博物馆学者的批评很明确。正如克劳丝（Krauss）在论文《后资本主义博物馆的文化逻辑》指出的那样，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引入文化生产领域，使公共文化机构的身份和规划发生了深刻变化。博物馆不仅与其运营背景的企业性纠缠不清，而且这种发展与全球化的形成紧密相关，并受到资本、人员流动与新通信技术的支持。因此，耗时费钱的研究必然不如轰动一时的展览、娱乐项目及吸引人的公共活动来得紧要。布尼亚（Bounia）将此描述为“人优先于物”，这一发展趋势引发了博物馆研究的作用与功能的辩论。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博物馆学者批评策展人^②被边缘化，其工作被留给服务经理与平台。这两项活动的分割线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资助模式的结果，博物馆独立部门的新建也推动了这一发展趋势，在这里宣教人员负责公众活动，而策展人则在幕后的馆藏中开展工作。这不仅造成了员工的内部分隔，还会导致研究与其传播的脱节。在斯伯丁（Spalding）的观点中，博物馆有风险发展成两个独立的机构：幕后的研究机构和幕前的热门主题公园。与之类似，芬克（Fink）展示了博物馆的公众娱乐活动如何简化对博物馆掌握的档案与原始研究材料的使用，布尼亚讨论了这种发展的风险，它使传统策展研究被认为是“精英的”，对博物馆领导和资助机构来说是“次重要的”。奥尼尔（O'Neill）为博物馆这两种角色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折中。他将此描述为“基础性博物馆”与“适应性博物馆”的紧张关系，两者都是博物馆的危险同化。前者视博物馆为优先馆藏研究的永久性专业机构，不顾周围社会政治的变

① 福柯认为，认识论是描述特定世界观或思想结构的工具，表征着与特定历史时期相关的一整套关系。有关此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事物的顺序：人文科学考古学》和《知识考古学》。

② 译注：curator这一术语内涵丰富，对应的中文译法较多，现暂译为策展人。

化，而后者认为博物馆的首要义务是服务观众。阿普尔顿（Appleton）进而认为，收藏是博物馆的中心职责，当下注重的社会融入则是偏离职守。在讨论如何处置研究与公众活动及其对立关系之前，笔者将先探索作为认知机构的博物馆。

三、作为认知机构的博物馆

关于博物馆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与公共博物馆的创始同时发生。安德森（Anderson）指出“所有早期博物馆（其中一些被视为珍宝柜）都与调查相关，即使这种研究现今被认为是不系统的”。直到新博物馆学出现，博物馆作为藏品精深研究与专业学科展览的场所，由“学者策展人”以学术研究的延伸方式进行管理。将博物馆作为研究机构的认知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直到被作为合法知识生产者的大学所取代。如今，博物馆研究的作用与相关性在博物馆学者和专业人士之间引起争议，尽管在出版物中记录较少。在博物馆学迈向新博物馆学的转折点上，麦克唐纳（Macdonald）提出将博物馆与展览理解为“理论的体现”。直到最近，这个概念才被重新审视，学者更加关注博物馆作为知识生产场所的作用。麦斯杰（Message）和威科姆（Witcomb）将博物馆描述为积极生产知识的场所，“理论是在博物馆内产生的”^①，替代了博物馆作为演示他处（如大学）知识生产的被动场所的认知。理解博物馆这种认识论的一个有用术语是康恩（Conn）所描述的“基于对象的认识论”，博物馆通常围绕它来组织：一方面是对对象本身，另一方面是对象所处的分类系统。在此意义上，笔者将博物馆理解为“认知机构”，在这里，藏品的内容及其按照抽象或具象秩序的排列，创造了博物馆本身包含与维持的知识体系。

博物馆同自然史、艺术史、设计史、人类学、考古学、文化史和科技研究等多种研究领域具有学科联系^②。这些研究领域有许多子领域，通常按其层级顺序组成更大的科学领域，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每个学科都植根于自己的谱系，继而产生学科方法论和知识态度。博物馆研究与其他研究一样，都有其主题、方法论、传播手段以及管理和存储研究数据的系统。博物馆研究涉及教育教学，参观者体验、健康、保护，营销与消费者行为以及传媒等多种主题，在此仅列举几例。同样，方法论框架包括视觉与形式分析、文本分析、材料分析、化学分析、历史与理论分析，具体取决于博物馆的专业化程度。博物馆研究数据的管理需要自有逻辑与基础设施的复杂系统，如清单和档案、卡片目录、文件柜、电子数据注册表等。此外，博物馆有多种向公众传播研究成果的方式：展厅与画廊等建筑空间、开放环境、实物与装置、出版物、网站、应用程序、播客、其他数字交互技术等。在组合这些要素，即研究主题、方法、传播和研究管理框架时，博物馆呈现出认识论形式。

笔者对博物馆作为认知机构的看法与托马斯（Thomas）所说的“博物馆即方法”接近。托马斯用“博物馆即方法”的概念挑战被普遍接受的认知，理论主要与学科保持一致，并限于学术讨论。在他看来，博物馆即方法是“发生的事情”的空间，强调进行博物馆研究时好奇心与偶然性的重要。这种研究活动带来的“方法学效力”表现在研究者准备好接受意外，对实物与藏品的惊讶，即使与现有权威学术知识相悖。在此意义上，博物馆是非传统研究实践的独特平台，与传统的学术研究相比，它能够吸引更多广泛的受众，并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该方法的灵感来自菲利普斯（Phillips）的观点，博物馆作为一个物体档案馆或存储库来运作，

① 译注：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② 研究密集型的博物馆如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不列颠博物院、泰特现代美术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德国历史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和哥德堡植物园。研究资料在大学附属博物馆中也很常见，这些博物馆是教学和研究平台，如牛津大学的皮特河博物馆、剑桥大学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博物馆、苏黎世艺术大学的设计博物馆、奥斯陆大学的文化历史博物馆、哥本哈根新嘉士伯美术馆以及作为冰岛大学一部分的冰岛国家博物馆。

提供独特的藏品，能推动其他来源无法检索的数据的发展。此类研究需要具备描述、技术和风格分析、文献记录、归因的专门技能。研究主题和方法论的宽泛引发了安德森“博物馆研究的性质显著不同”的观点。因此，博物馆研究抵制任何形式化定义。相反，它采用德瓦莱（Desvallées）和迈瑞斯（Mairesse）在《博物馆学的关键概念》中所定义的抽象形式：“在博物馆中，研究包括发现、发明和推动与博物馆藏品或活动相关的新知识的智力活动与工作。”这种对博物馆研究的认知与学术界对研究概念的典型认知相一致：“为增加知识储备（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与发展现有知识的新应用而进行创造性、系统性的工作。”

四、科学层级中的博物馆研究

西尔弗曼（Silverman）和奥尼尔理解博物馆的作用是“同时为某人和某事服务”。博物馆双重性质的概念也可作为理解其他研究领域背景下博物馆研究的有用基础。笔者从伯格多夫（Borgdorff）的艺术研究讨论中得出这一假设，他解释了此类研究成果在认识论上的双重贡献。在认识论上，各种知识存在区别：一方面，知道某事的事实（理论知识、命题知识、显性知识、焦点知识），另一方面，知道如何做某事，创造某事（实践知识、具象知识、隐性知识、意会知识）。博物馆研究在这两个领域也同样运作，在学术讨论（出版物）和文化空间（博物馆、画廊）之间，或者在散漫与沉浸之间摇摆。托马斯关于策展人“作为特定领域的专家（艺术史学家、考古学家、昆虫学家）和博物馆策展人”的双重角色观点与之特别相关。正因博物馆具有这种独特能力，使其不仅可以跨越学科之间的界线，而且可以在科学与文化领域同步运作，从而巩固作为研究机构的地位。这样，博物馆就

处于在科学与文化的交界开展研究实践的独特位置，在这两个世界中判断其相关性与有效性。如果博物馆作为跨越边界的机构有更高的地位，正如简斯（Janes）和桑德尔（Sandell）的呼吁，当前倡导的博物馆行动主义可能会得到发展。毕肖普（Bishop）批评与博物馆营销和新自由主义文化政治相关的“2000年后主题收藏”。她认为，这样的博物馆实务必然会“取悦所有人群，不必使机构与任何特定的叙述或立场保持一致”。

博物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组织专营机构，在全球有五万五千家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制定了共同的行业准则，促进了批判性的自我理解。简斯和桑德尔强调博物馆在汇集信息、科学知识和行动选择方面的作用，主张博物馆不应成为中立的牺牲品。基于此，博物馆比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具有优势，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中立的，不能在像气候变化或右翼民粹主义等问题或辩论中表明立场。另一方面，博物馆有可能以负责任的态度公开自己的立场、积极地支持或反对某一问题，最好是与它们所处的社区合作。也许最近博物馆学对自由性、实验性和创造性研究实践的强调将会增强这种可能性^①。当前科学体系的断裂可能会为博物馆作为认知平台的兴趣增长打开空间，不仅在博物馆学内部，而且在对跨界活动感兴趣的其他研究领域中也是如此。现代主义时期各学科间的分界线日益模糊，如今，理论与概念在各学科间迁移被学者普遍接受。此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间的传统区别正在瓦解，科学与文化间的界限正在溶解，两个领域间形成了相互渗透的关系。这一发展促使人们更仔细地审视学术界与博物馆的关系。坎尼佐（Cannizzo）和菲利普斯讨论了展览的学术方法与博物馆方法间的紧张关系，指出博物馆研究人员在谈及传播成果时更倾向于贴近前者。他们强调学术模式的局限性，表明学术研究文化是个人主义和竞争性的，除了学术文化主要是书面

① 这一趋势与其他新兴的研究形式相一致，例如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研究，见参考文献[5]、[12]。在视觉人类学和感官民族学中也有丰富的创造性研究形式，见参考文献[29]、[31]。另外，新兴的艺术研究领域也为艺术实践向艺术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有趣的辩论，见参考文献[8]、[25]。

文化这一明显事实。结合巴尔（Bal）对学术出版物同行评议制度的批评，她认为这主要是大学新自由化的结果，无论是在传播的方法还是形式上，学术研究的形式限制都很清晰。文献中的发展趋势，如布凯（Bouquet）、坎尼佐和菲利普斯的工作，都表明博物馆研究人员正被鼓励从学术研究模式的局限中解放出来，充分利用博物馆研究与展览传播技术的潜力。在此意义上，许多博物馆学者认为持续的反思是更新博物馆研究方法的基础。

格鲁科克（Grewcock）建议博物馆工作人员实践所谓的“关系博物馆学”。在他看来，进行关系研究是“不断询问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如何形成和重新形成这种认识，关注隐藏与不那么隐藏的问题”。同样，麦斯杰和威科姆将博物馆视为“促进反思性理解的媒介”，而莱曼-布劳恩斯（Lehmann-Brauns）、西肖（Sichau）和特里施勒（Trischler）指出“需要反思研究活动与展览亲密且微妙的关系”。此外，莫斯（Moser）批评道，缺乏对展览促进社会发展重要性的反思。类似地，赫尔（Herle）说明了博物馆如何成为他处进行研究的被动存储库。赫尔在对该问题的提议中强调，策展过程是知识生产的合法工具：“作为研究的展览提供了系统调查、发展与证明特定理论方法力量的机会。”麦克唐纳（Macdonald）和巴苏（Basu）坚持认为“当代展览实践不能仅被视为展示和传播已存在的、预先形成的知识的手段”。相反，他们认为展览是知识产生的场所，而不是复制的场所。同样，奥尼尔对所谓的“博物馆认识论的缺陷结构”进行了批判分析，这是支持实证主义与维多利亚式永久性展览方法的范例，在这种展览中，知识被呈现为持久、完整与永恒的。相反，他建议博物馆根据任何特定时间的新兴知识，为展览实践创造空间，以支持能随时间发展的展览。

新兴研究形式的出现为知识生产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有趣的见解。人们越来越关注研究成果的非话语性表现形式，其中“隐性知识”、“物质知识”和“感性知识”等概念正在合法化。这种科学层级的破裂为包括博物馆研究在内的新兴知识生产形式创造了重要机会。然而，这只有在博

物馆研究为非传统形式的研究提供更多空间时才有效，如布凯、坎尼佐、麦克唐纳和巴苏所倡导的那样，采纳自由性、实验性与创造性的博物馆研究实践。博物馆（尤其是那些不在艺术领域开展业务的博物馆）可将最近进入的策展实践作为一种研究形式来看待。这位研究领域的新来客被视为“策展领域的扩大”，策展的成果延伸到博物馆与学术界外。它已将策展人明确表述为“研究行动本身”，其中知识生产存在问题且不稳定。当然，这种范式对博物馆研究者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闻，但围绕它的论述似乎还没有进入博物馆学领域。

五、结论

尽管奥尼尔对博物馆认识论的设想“整合博物馆获得、生产、配置与传播的所有形式的知识”可能过于宽泛，但他的方法仍是笔者将博物馆作为认知机构进行理解的出发点。在本文中，笔者探讨了过去三十年左右在博物馆学文献中博物馆研究的倾向和态度，论证了博物馆研究的双重能动性，即如何同时影响科学与文化领域，这是博物馆研究成果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传统研究实践中独树一帜。在发展博物馆研究理论时，笔者发现了空白并指出了盲区，同时指出研究与其他核心要素并列这一反复出现的主题。这种二分法只会适得其反，并催生博物馆实务的划分与细分，它偏向于新自由主义文化观点。新博物馆学倡导的社区博物馆和民众推动的文化活动，增强了博物馆的游客服务与公共关系，削弱了研究型博物馆的工作能力。

如上所述，笔者相信只有阐明博物馆研究过程的独特认识论性质，包括其传播方法与手段，才能在博物馆学与博物馆实务中为研究开辟空间。由此，研究与博物馆实务其他核心要素的关系就显现出来了。通过确定材料、时间、空间和感官在博物馆研究实践中的作用，我们能够构建博物馆研究的认识论，并将其与其他科学领域联系起来。只有了解这些特质，我们才能更好地配备工具来分辨知识的真正内容。

参考文献

- [1] AMBROSE T, PAINE C. Museum basic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M].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2018.
- [2] ANDERSON R. To thrive or survive? The state and status of research in museums[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05, 20 (4): 297–311.
- [3] ANDERSON G. Reinventing the museum: the evolving conversation on the paradigm shift[M]. New York: Alta Mira Press, 2012.
- [4] APPADURAI A.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5] BARAD K M.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6] BENNETT J.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7] BENNETT T. Museums, power, knowledg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8] BORGdorff H. The conflict of faculties: perspectives on artistic research and academia[M].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9] CARBONELL B. Museum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contexts[M].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2.
- [10] Cavalli-Björkman G, LINDQVIST S. Research and museums (RAM):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Stockholm, Sweden, May 22–25, 2007[C]. Stockholm: National museum, 2008.
- [11] DUNCAN C. Civilizing rituals: inside public art museums[M]. London: Routledge, 1995.
- [12] FEYERABEND P.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M]. London: Verso, 1978.
- [13]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M]. London: Tavistock, 1970.
- [14]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Tavistock, 1974.
- [15] FULLER N. Recogniz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knowledge needs of museums[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05, 20 (3): 271–276.
- [16] GRAHAM M. Assessing priorities: research at museums[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05, 20 (4): 287–291.
- [17] HERLE A. Exhibitions as research: displaying the technologies that make bodies visible[J]. Museum worlds: advances in research, 2013, 1 (1): 113–135.
- [18] HOOPER-GREENHILL E. 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M]. London: Routledge, 2000.
- [19] LEHMANN-BRAUNS S, SICHAU C, TRISCHLER H. The exhibition as product and generator of scholarship[M]. Berlin: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0.
- [20] LEVIN A K. Gender, sexuality, and museums: a routledge reader[M]. London: Routledge, 2010.
- [21] MACDONALD S.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M]. Oxford: Blackwel, 2011.
- [22] MARSTINE J. New museum theory and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M]. Malden, MA: Blackwell, 2006.
- [23] MARSTINE J.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useum ethics[M]. London: Routledge, 2011.
- [24] MASON R, ROBINSON A, COFFIELD E. Museum and gallery studies: the basics[M]. London: Routledge, 2018.
- [25] Michelkevičius V. Mapping artistic research: towards a diagrammatic knowing[M]. Vilnius: Vilnius Academy of Arts Press, 2018.
- [26] MILLER D. Material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culture[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2005.
- [27] MOSER S.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museum displays and the creation of knowledge[J]. Museum anthropology, 2010, 33 (1): 22–32.
- [28] MYERS F. The empire of things: regimes of value and material culture[M]. Santa Fe: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2008.
- [29] PINK S. 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9.
- [30] REID M, NAYLOR B. Three reasons to worry about museum researchers[J].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2005, 20 (4): 359–364.
- [31] SCHNEIDER A. Anthropology and art practice[M].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 [32] THOMAS N. The return of curiosity: what museums are good for in the 21st Century[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6.
- [33] TYBJERG K. Exhibiting epistemic objects[J]. Museum & Society, 2017, 15 (3): 269–286.
- [34] VERGO P. The new museology[M]. London: Reaktion Books, 1989.
- [35] WITCOMB A. Re-Imagining the museum: beyond the mausoleum[M]. London: Routledge, 2003.